



新诗研究丛书



新诗的大众化 和纯诗化

刘继业

著

Xinshi De Dazhonghua
He Chunshihua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207.25/39

2008



新诗的大众化 和纯诗化

刘继业 著

Xinshi De Dazhonghua
He Chunshihua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诗的大众化和纯诗化/刘继业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4

(新诗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3458-0

I. 新… II. 刘… III. 新诗-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6332 号

书 名: 新诗的大众化和纯诗化

著作责任者: 刘继业 著

责任编辑: 张雅秋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458-0/I · 202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异 16 开本 20 印张 290 千字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序：新诗研究路上的一个“初来者”

孙玉石

中国新诗史的学术研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大体上完成了由克服意识形态笼罩下的政治美学观念向关注诗歌艺术本体的突破与转折，由思潮流派平衡共生的深入研究改变既成文学史格局的努力，向更为沉潜性的诗学问题探索与开掘，正在悄悄发生着带有学术史性质和意义的转变。

在这种转折中，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六七十年代诞生的一些青年学人，开始走进新诗历史研究的领域。他们在这片寂寞土地上的垦殖，已经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偏至对于学术研究、学人心态的种种压力和束缚，以大胆、轻松而富有学理的心理姿态，向现代诗歌史纵深的诸多问题，进行着沉实与辛勤的开拓。这些“初来者”们，或已经收获了新锐锋芒的丰实成绩，或在稚嫩的开掘中隐约透露出探索者青春的光亮，为新诗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的思考。

我这里介绍的刘继业，就是属于后面这样情况的一个陌生的“初来者”。

刘继业的书稿《新诗的大众化和纯诗化》，是一部关于新诗理论整体走向和新诗诗学发展史研究的学术专著。自五四时代新诗诞生之初期，新诗本身的属性，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这个隐含着诗歌艺术本体与接受群众之间关系的理论问题，就开始了意识形态层面和艺术创造层面的纷争与讨论。这场讨论，虽然没有获得一致的结论就匆匆结束，但是争论背后所隐含的问题，却长时间里搅动着几代诗人们的美学心理、艺术选择和理论思考。它在理论思考上的深层核心，乃是侧重诗歌现实功能的新诗大众化追求与关注诗歌审美建构效果的纯诗化问题的分歧。这里的所谓纯诗化，当然只是一个为了论述方便而借用的

概念,它是讲这个潮流更多一些注视新诗艺术美的探索与创造,其中也包含了对于现实生活不同层面和程度不一的关注,但总体上可以说它是与西方诗歌中流行和阐释的“纯诗”概念不甚相同的。

这部著作,就是从这样一个特定的视角——新诗大众化和纯诗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入手,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新诗诗学的发展,作了一次整体的、宏观的、富有原创性的思考和把握。这样一个特定的视角,应该说不是来自一个既定的诗学理论体系,或者作者个人沉想的诗学观念,而是来自中国现代新诗诗学发展史本身,是从历史的梳理之中得出的。并且,作者在梳理过程中,抓住这样两种诗学倾向相互纠缠的视角,既符合现代诗学发展的客观现实状况,可以见出现代诗学发展的内在的本质性特征,又能体现出作者力求客观平衡的审视过程,隐约显示出一些新颖和独到的理论思索与发见。书中没有刻意引进西方流行的新的理论与方法,作一种理念先行的理论概括,也没有用特定的理论体系或观念,去整合现代诗学发展的复杂状况和问题,能于大体遵照历史走向与存在内部关联的脉络中,从理论批评与诗学论争的现象中,努力呈现出自己构建的历史记忆和诗学图景。这样的做法,为这部著作获得了一种诗学史、文学史研究所应该具有的客观、严谨、坚实的品格和风格。

历史现象的偶然往往都是在历史必然和内在联系中发生的。本书论述的诸多问题,看上去大都是不同时段里发生的一些偶然的诗歌现象,实际上却都存在着历史的或理论的内在关联。书里用了五章的篇幅,分别梳理、辨析了20年代的新诗平民化与贵族化论争、30年代的“国防诗歌”论争、“抗战诗歌”论争、贯穿三四十年代的朗诵诗诗学思考和关于40年代街头诗、方言诗等的诗学探索,自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经由冯至至“中国新诗派”的“纯诗运动”等大量诗学现象。这些论析,对于整个现代新诗诗学的发展作了一次全面的思考和历史基本线索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又以个案分析的方式,进一步阐释了对于两个诗学范畴和现代诗坛关于《汉园集》、《马凡陀的山歌》两本新诗集的探讨、关于徐迟、何其芳、袁水拍等三个代表性诗人诗学选择的深入辨析与思考。从全书的整体结构来看,从纵向的史的发展线索到横向的诗

学范畴、诗人的诗学选择，作者对于两种诗学各自的发展和相互之间的复杂纠缠，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基本上显示了现代新诗诗学发展史的整体面貌，又使大量具体、生动的诗学现象，得到了宏观把握和微观处理相结合的理解和阐释。

全书写作中，能够自觉地运用历史的眼光，尽可能开阔的视野，同时又力求使论析做到扎实、细密，洞烛发幽，见微知著，因之能在或熟知或新见的史料整理中，驰骋自己的理论思考，道出有所发现和创新的意见来。例如对于抗战时期《文艺阵地》杂志上发表的两篇重要论文的分析，说锡金的论文《诗歌的技术偏至论者的困惑》，已经动摇了纯诗论者的“立脚点”，宣布了纯诗的“没落”；穆木天的论文《关于抗战诗歌运动》，则着重于抗战诗歌本身的诗学建设，“这里显示了大众化诗学向纵深开掘的内在线索和一种隐秘的诗学逻辑”，“锡金全力批驳了纯诗论者的抗战诗歌否定论，穆木天则详细论证了抗战诗歌自身发展的传统和趋势。他们代表了大众化诗学在与纯诗诗学围绕抗战诗歌的论争中采取的两种有效的姿态和策略”。又如，对于徐迟 1938 年初在桂林出版的《顶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里提出的“抒情的放逐”论，遭到众多诗学理论家批判的现象，进行颇富说服力的梳理与辨析，提出了理论本身和历史发展都证明这是“一场失效的批评”的观点。对于诗人徐迟在抗战中及其前后的诗歌创作与理论主张变化的复杂性与内在理路的分析，也充满了富有新意而深入的思考。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论述朗诵诗部分的文字，更在史料搜集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颇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见解。通过吕荧分析艾青诗的实例，论述了朗诵诗学一体化、标准化，给新诗创作带来的“潜在影响”：排比句式的大量敷衍，赋的铺张手法泛滥，创造性隐喻的被排斥，甚至对于非朗诵诗作品的渗透。再如，书中论述了 40 年代以后，倾向于纯诗的诗学怎样逐渐伴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而隐入幕后，却又依然对大众化诗学起着一定的制约、制衡作用；两者在一个特定诗学问题上冲突、对立到怎样的情形，又怎样隐秘地相互吸取、融合对方的一些合理的因素。

这部书稿另外一个特点与收获是，对于许多新诗诗学发展的史料，

做了大量细致耐心的辨析和发掘工作。作者在书稿的写作中,始终坚持大量运用第一手的原始史料,对于学术界已经熟知的史料不作过多的引述和阐说。书中有许多史料,是为先前的研究者淡漠忽略或没有能够搜求得到的。如梁宗岱批评抗战诗歌中“伪诗假诗”现象,在香港《大公报·星座副刊》上发表的两篇论文:《论诗之效用》、《谈抗战诗歌》;袁可嘉收入《新诗现代化》一书之外的另三篇论文《创作与批评的起点》、《诗的再解放——〈新批评〉自序》、《现代英诗的特质》及一篇译诗论文《解释现代诗中的现代性》;徐迟以“余生”笔名,在《纯文艺》上发的文章《〈荒原〉评》一文,等等。论文中许多新资料的发现,第一手材料的大量运用,为新诗研究的拓展和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也显示出作者在进入学术研究之初就努力养成的客观扎实、严谨认真的良好学风。

伴随本书突破性理论思考的,也可能就是这些思考本身带来的某些疑问和弱点。如诗的大众化是否完全能用实用性、功利性的诗学立场来概括?在平民化与纯诗化两个诗学立场之间,还有没有另外与它们并不全然一致的诗学立场现象?是否纯诗化以外的诗歌创作与诗学主张都可以概括在大众化、平民化的潮流里面?作者本身显然不赞成二元对立的诗学思维模式,但在自身论述中如何能够避免陷入这种思维模式的约束?作者批评“二元对立的模式开始顽固地支配着整个诗坛”,但是自身的理论设想与历史叙述,有时又无法避免以偏概全的弊病。甚至只能承认出现了一种难以解说的复杂的困惑局面:“有时无法简单地以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方式来把握。”由此看来,如何更细致更历史化也就是更科学地看待两种诗学倾向的问题,以及两种不同“诗学体系”的建设和他们之间交缠不清的关联?还需要做更为艰苦的研究工作。

自新时期二十七八年以来,新诗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诗人诗作、诗潮流派以至新诗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不少突出的成果。但是,关于新诗诗学理论批评和诗学论争方面的专题研究比较有分量的深化性的成果,到目前仍然是一个较为薄弱的方面。我相信这部书稿的付梓问世,会在这个方面给人们的期待以某些满足。为此,我啰啰嗦嗦地

写了上面这些话，算是重读书稿后的一些肤浅的感想，并愿意向更多人推荐的一种“自言自语”的诉说，借用当下一个时髦的词汇说，也是一个老师对自己学生“在路上”的一种祝愿和期待吧。

2007年5月30日

目 录

序：新诗研究路上的一个“初来者”	孙玉石 (1)
绪论	(1)
第一章 新诗平民化和贵族化论争	(7)
第一节 论争的平民主义背景	(8)
第二节 论争的展开	(13)
第三节 论争的余波和影响	(22)
第二章 诗学的自由竞争和均衡状态	(31)
第一节 西方纯诗诗学简述	(31)
第二节 现代诗学的纯诗化追求	(36)
第三节 战前诗学的自由竞争	(42)
第三章 战争状态下的交锋	(61)
第一节 “抗战诗歌”论争	(61)
第二节 “抒情的放逐”及其他	(74)
附录一 论诗之应用	(89)
附录二 谈抗战诗歌	(94)
附录三 我也谈谈朗诵诗	(98)
第四章 朗诵诗理论探索与中国现代诗学	(102)
第一节 诗朗诵与朗诵诗：两种路向的实践	(102)
第二节 纯诗诗学的朗诵诗观	(109)
第三节 大众化朗诵诗学的探索	(117)

第四节 大众化诗学的反思·····	(126)
第五节 结论·····	(132)
第五章 40年代大众化诗学体系的构建和纯诗复兴 ·····	(134)
第一节 大众化诗学的拓展与开掘·····	(135)
第二节 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诗学交锋·····	(148)
第六章 论争中的两个诗学范畴 ·····	(172)
第一节 “懂”与“不懂”问题的诗学思考·····	(172)
第二节 题材、主题和艺术过程的两种偏执·····	(185)
附录四 《荒园》评·····	(198)
第七章 两种诗学视野中的《汉园集》和《马凡陀的山歌》 ·····	(203)
第一节 两种诗学视野中的《汉园集》·····	(204)
第二节 聚讼纷纭的《马凡陀的山歌》·····	(210)
第八章 时代漩流中的诗人个体诗学选择 ·····	(224)
第一节 徐迟:积极前行之中的犹疑与反顾·····	(226)
第二节 何其芳:不断前进中隐秘的纯诗情怀·····	(243)
第三节 袁水拍和马凡陀:大众化新诗“双子”星座的 华彩·····	(261)
第四节 余论·····	(271)
附录五 论梦中道路·····	(277)
结语 ·····	(282)
新时期新诗理论批评研究概述 ·····	(286)
主要参考文献 ·····	(295)
后记 ·····	(305)

绪 论

八十多年过去了,“新诗”这个概念还没有变得陈旧,新诗依然处在不断探索的途中,远未成熟。但是新诗在这种探索的路途之中,也在逐步、自然地生成属于自身的传统。撇开具体的诗歌创作实绩不谈,单纯从诗学建设的角度观照新诗,可以看到这里存在着一种并非简单、却依然较为清晰的两极对立的诗学思维模式——新诗的大众化和纯诗化这样两种不同的诗学追求倾向。中国现代新诗正是在两种诗学倾向的对立和竞争之中曲折前行的。

“纯诗”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在西方文学史上,“纯诗”是一个复杂的、需要细心辨析的诗学概念和命题。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真正属于西方纯诗范畴的理论成果,并不能形成一个与大众化诗学相抗衡的力量。这个概念,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也不是隶属于英、法现代诗学系统的一个同一性概念,更多的时候,是被大众化诗学在某种贬义上用来指称一种与其相对立的诗学倾向。少数介绍西方纯诗理论和致力于汉语纯诗探求的中国诗人,在新诗史上,也还构不成一个贯穿一致、与现代新诗发展相始终的完整、清晰的线索。但是,重视新诗内在的、自足的艺术价值和艺术规律,寻求新诗的自律性和独立的艺术地位,与对新诗做实用性、功利性、社会性、政治性理解的诗学倾向,前者对后者一贯保持着警惕和批判的立场,代表这样一种倾向的诗学思考,倒是新诗史上一个鲜明的、贯穿始终的脉络和线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使用与“纯诗”相应的“纯诗化”这一概念,用来指称和大众化诗学互相竞争、互相抗衡,并且相互纠缠、相互渗透的一条大的新诗诗学发展的趋向和脉络。而且,就是“纯诗”,在现代中国新诗史上,也必然是一个有别于西方诗学的新概念,超越了西方诗学中具体的诗歌流派特征。即使在当代新诗中,这一概念,也并非仅仅指称现代主义的诗学范畴,而是一种诗学思考的倾向和趋势。但是,和现代诗学相比,其内

涵却又又有缩小的征象。

让人放心的是,这样一种归纳和这一个诗学概念、诗学命题的使用,在现代新诗史上有着坚实的史料支持,它来自现代诗学。整个现代诗学正是在两种异质诗学的对立、竞争之中,逐步形成自己特有的面貌的。

从20年代由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发起的诗的贵族化与平民化之争,到30年代现代主义诗人群与以“中国诗歌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阵营诗人之间的诗学交锋,以及40年代,无论在解放区还是国统区,大众化诗学都逐步取得主流地位的过程中,这两种诗学都有着较为复杂的相互交错、相互渗透和相互纠缠的情形。更多的诗人如王独清、陈梦家、戴望舒、曹葆华、徐迟等,都有一个明显的创作上的方向转换,而穆木天、何其芳、卞之琳等诗人,不但在诗歌创作上呈现明显的转变,同时也在诗学思考之中,做出了相应调整,实现了艰难的诗学蜕变。这两种诗学之间的交锋,在现代新诗史上的结果,是大众化诗学逐步占据主流地位。但是,纯诗追求也从来没有消失,并未被完全压制,而是更为顽强地制约着一批诗人的创作和他们的诗学思考,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诗学立场和诗学思维方式。同时,它也对大众化诗学起着潜在的制约、制衡作用。在这两种诗学的对立与竞争、交错与纠缠的过程中,两种诗学自身也都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40年代、尤其是40年代中后期的诗学,明显具有一种综合的倾向,这是新诗研究界已经达成的共识。这种状况的形成,无疑也与两种诗学复杂纠缠的情形息息相关。

从两种诗学的对立与交错、大众化诗学逐步取得主流地位的进程这个角度来考察,许多具体的诗学问题也能得到比较合理的理解和把握。诸如20年代的“丑的字句”、“普罗诗歌”等的论争,30年代关于新诗“懂与不懂”的讨论,“国防诗歌”、“抗战诗歌”的论争,跨越三四十年代的围绕“抒情的放逐”的不同意见,40年代新诗的散文化、诗人的分化、转变,诗坛围绕《马凡陀的山歌》的激烈争论,以及横跨解放前后的“何其芳现象”等等一系列的诗学命题,在两种诗学对立与竞争、交错与纠缠的大线索之下观照,能得到更为合理、深入的解释。选择从这一角度进入新诗理论和新诗诗学建设,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式和途径。同时,两种诗学的复杂纠缠,在一些关涉整个新诗发展进程的诗学问题

上,体现得尤为清晰、完整。譬如朗诵诗运动,被大众化诗学视为新诗大众化的两种途径之一(另一种途径为新诗歌谣化),到40年代,更被视为新诗大众化最重要的途径和方式。朗诵诗还成为衡量整个新诗创作的艺术参照和艺术标准。反过来,从两种诗学对立与竞争、交错与纠缠的角度来看持续了近二十年的朗诵诗探索,也可以发现一些很有启示的结论。两者可以相互比照、相互阐发。

与两种诗学的对立、竞争和交错、互渗的复杂演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身处漩涡之中的诗人个体的诗学选择、诗学调整、诗学转换。整个诗坛风习的演变,正是由各个姿态各异的诗人个体来承担的。有始终坚持纯诗立场不变的,如梁宗岱(也有一些细微的地方接受了大众化诗学的影响);有更多越来越坚定、成熟的大众化诗学的追求者,如锡金、王亚平、阿垅;有理解并试图靠拢大众化诗学、却从未放弃纯诗立场的,如朱自清、冯至、戴望舒;更有诗人由纯诗论走向大众化诗学,如何其芳;也有已走向大众化诗学却又时时犹疑反复的,如徐迟……这种种各异的姿态里,存在着两种诗学复杂纠缠的内在、顽强的制约力量,而这种各异多方的诗人个体诗学选择,又反过来阐释、充实了两种诗学复杂纠缠的内涵。而且,这中间蕴涵的诗学启示,也是最为丰富的。

在当代诗学的建立过程之中,“文革”之前,是现实主义诗学一统诗坛的局面,是三四十年代新诗大众化诗学追求的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自然延伸。新时期以来,诗学同样经历了一种必要的反拨,但也无法单纯纳入纯诗追求的勃兴。当代诗学的发展无法继续视为两种诗学交锋的进程,但是,在新时期以及90年代的新诗发展,即便不能归纳为两种诗学的对立(大众化诗学基本处于被压抑的境地),但是一种两极对立的二元诗学思维模式,依然让从前面的课题走出来的人们感到这里有一种隐秘的、并不陌生的制约力量。朦胧诗论争以及90年代所谓学院派与民间派的矛盾,体现出来的某些思维模式、思维特征,甚至具体的人事及行为方式,都与新诗在确立自身传统的过程之中,积淀的某些特征有着隐秘而顽固的联系。在现代新诗的历史发展背景中,考察当代诗歌的进展和某些具体的诗学现象,同时也可以由当代新诗的现状返观新诗传统的特质,由此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即使超

越具体的诗学内涵,也可以对一种根深蒂固的诗学思维进行一些必要的观察和反省。

具体地展示和论述新诗诗学如何从正常的论争和自身理论建设中逐渐发展为一种主要受意识形态支配的诗学斗争,并且在这种大致的诗学一体化进程中,如何形成现代新诗诗学自身比较突出的特色和局限,将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

在现代新诗的发展史上,现实主义诗学无疑是一个贯穿始终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占据着诗学中心的、影响最为广泛的诗学潮流,而现代主义诗学则经常处于一种受压抑的境地,虽然在二三十年代也有过一段并不短暂的黄金时期。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往往将这两种诗学的不同命运理解为现实主义诗学对现代主义诗学的一种外在于诗学本身、依托政治强势取得的不公平的胜利。由此,新时期以来,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反而更受关注,成为学术界和创作界关注的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而现实主义诗歌及其诗论成果的研究,则处于相对冷落的境况。在两种诗学追求之间做一种简单的价值衡量,或者从一种预设的、理想的诗学标准出发,来对两者进行一种事后的评判,都难以达到较为客观、令人信服的理解。只有从具体的新诗历史发展的境遇出发,力求较为翔实地展示新诗理论发展的丰富形态和取得的成果,从对大量史料的梳理和把握之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才有可能达到较为客观的学术结论。

本书的出发点,不是出于价值评判的目的,而是尽量理解史实之所以然的理由。也就是说,这里基本上还是一种属于史——诗学史、文学史——的研究。尤其是因为关于新诗大众化的研究目前还十分薄弱,一些材料的发掘、梳理也将是特别着力之处。无疑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的诗歌研究论文和专著,依然局限在一个人所共知的材料里,在人所共知的材料范围中尽量做出一些自己灵感突现式的别一种理解。无疑,这也是新诗研究尚有待突破的一个局限,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新诗研究要想真正达到对研究对象的原生态丰富性的展示和把握,还得回到对大量历史细部的体会和揣摩。也许史料范围的拓展,目前来说依然是保证新诗研究水准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

但是,选定这样一个具体的诗学命题,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详细地论述这个诗学理论命题的来龙去脉。通过这个命题的解决显示新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诗学发展的脉络与线索,一个看似有些小、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诗学命题的丰富内涵,同时也可以对当下的诗学建设达到一些切合实际的理解。所以,尽管说不能以一种预设的、既定的诗学标准来评判现代诗学成果,但还是必须在中外诗学的对比研究之中,来见出新诗诗学的独特之处,梳理清这一个命题中蕴涵的中外诗学渊源和新诗诗学在吸收已有诗学资源时的变异和创新。所以,比较诗学的思路,将是一个贯彻始终的内在性东西。这里也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命题。比如说,从新诗产生的时候开始,就有一个几乎得到公认的观点,即新诗主要是吸收外国诗歌的营养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异域诗学营养中,作为我们论述主题的大众化这种诗学追求,却并不是一个充分发展了的诗学命题,而在现代中国诗学中,却几乎是一个在短暂的时期内就生长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如果这一现象得到了阐明,那么,在接受西方诗学的过程中,现代中国新诗理论建树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可能得以展示,可以更具体地感知诗人在中西诗学背景下的一种现实选择。大的理论创新并不是目的,甚至也还不是目前整个新诗研究的主要目的和有可能取得突破之处,但是,在这些关涉具体诗学问题的地方,还是可以进行一种较有意义和价值的理论探寻和发现,或者对一些看似已有结论的诗学命题,能得出一些新颖的、也更合理的发现。当然,在具体的论述之中,不可避免地,也必须不时地利用中外诗学的成果,来对现代诗论做一些比照式、验证式的阐述。基于对象本身在不同的特定历史阶段所积淀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如何处理好文学社会学和微观诗学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一个不小的挑战。

以一个贯穿整个新诗史的诗学命题作为研究对象,必然面临材料取舍和论证方式方面的难题。这里注重于诗学论争线索的勾勒和两种诗学内在逻辑的把握,基本不对单个诗人的成果做专章论述。以两种诗学的对立与竞争、交错与纠缠的复杂运动作为研究对象,也只注重二者之间展开的论争,以及二者在一些具体诗学问题、诗学范畴上各自的立场和观点。也就是说,只关注与两者都有关的命题和概念,因而对纯

诗论和大众化诗学各自的发展脉络与细致的线索,试图做一些必要的、简洁的概括,却并没有必要梳理得非常清楚。而且,这里考察的是现代诗学的发展,对于具体的新诗创作基本没有涉及,也是有理由的。一是基于新时期以来诗论研究薄弱的现状,因而试图着力在诗论研究的范围内做一次较为集中、完整的摸索和尝试。二是考虑到新诗作品及诗人研究在目前的学术界已经做得比较充分,同时结合创作实绩的写法又不可避免地会使论述变得臃肿和拖沓。当然,在涉及诗人个体的诗学选择、诗学蜕变情形的时候,也必不可免地要试图做一点少量的文本分析。在写作中,涉及论题的各种材料,遗漏也在所难免,只能尽量围绕着具体的诗学命题,来选择和组织史料,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史料范围内,选择有代表性和突破性的,以及一些以前并不经常为学术界注重的材料。

最后,有必要说明,“诗学”这一个概念,在这里自然只是一种狭义上的使用。这一个概念来自西方,指称一般的文学理论或对各种文学类型同一性和多样性等的探求。但是,单纯以诗歌来限定诗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也是一种可以让人接受的方式。1966年,让·科恩轰动一时的论著《诗歌语言的结构》,就把诗学定义为“以诗为对象的科学”。^① 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诗学”这一个概念的。

新诗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和许多重要的成果,而现代诗论研究则相对单薄与沉寂。而且,目前基本上还局限在对单个诗人或诗论家诗论的梳理和辨析上面。基础性的资料建设也还没有取得阶段性的成果,综合性的理论研究自然也难以有大的突破。本书的写作就面临着这样一个缺乏多方面的借鉴和参考的条件,因而操作起来倍感艰难。试图在一个开掘得还不太充分的领域做一次学术探索,本书或许会因此取得它自身存在的较坚实的理由,果如此则幸甚。

^① [法]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94页。

第一章 新诗平民化和贵族化论争

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诗学追求,即新诗大众化和纯诗化。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现实主义诗学与现代主义诗学的分歧,因为新诗从产生以来,和整个现代文坛的风习相一致,就一直存在着为人生的和为艺术的两种思潮。新文学初期,田汉就作过一个细致、合理的区分。他认为,艺术起源于艺术的冲动,而“艺术的冲动中,有一种为经济学上所谓在内在目的 interior object 的,便是‘游戏冲动’Play-impulse。有一种外在目的 ulterior object 的,便是实用冲动 Plactise-impulse。游戏冲动表现于艺术的是‘为艺术的艺术’Art for art sack,意义与价值 Meaning and Value 在快乐或可谓‘乐在艺术之中’。实用冲动表现于艺术的是‘为人生的艺术’Art for Life's Sake,其意义和价值在实用或可谓‘乐在艺术之外’。”^①从新文学初期开始,确实就存在着这样两种不同的、自觉区分的文学倾向。而且,新诗大众化和纯诗化也并不和新文学中“为人生的”和“为艺术的”两种思潮的区分相吻合。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使得文学与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成为一种普泛化的认识和要求,这时,所谓“为人生的”与“为艺术的”区分,已失去了最初存在的意义。但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诗歌创作和诗学思考中,仍然有一种立足于现实,却依然坚持追求诗歌自身独立的价值、反对以实用性和工具性的观点看待诗歌的艺术倾向,这种倾向也并不能完全以流派或主义来划分。而且许多时候,即使是同一个诗人,也会有两种不一致的诗学思路前后区别甚至同时存在着。这里,我们以“纯诗化”这一概念来指称这种独立于流派、主义或社团等之外的诗学追求倾向,而并不在单纯的现代主义诗学意义中使用这个概念。新诗大众化则是新诗史上一个较为长期的、

^① 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八期,“诗学研究号”,1920 年 2 月 15 日。